

## 书评

## 邓小南主编《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——以宋代为重点》读后

刁培俊,杨辉建

邓小南主编《政绩考察与信息渠道——以宋代为重点》(以下简称《信息渠道》)一书,2008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。这本论集是近年来在学界所倡导的“走向‘活’的制度史”研究取向之下的又一具体实践。在新的问题意识与学术议题的推动下,该书所透视出的方法与角度,颇值得重视。

## 一、议题设定与研究内容

《信息渠道》由《前言》、上编《课绩与考察》和下编《上传与下达》三部分构成。在前言里,主编者叙述了该论集议题的形塑过程、中心议题以及方法意旨等,并指出上下编“一组以政绩考察为中心,结合讨论‘辨核名实’以及相关信息的来源问题;另一组则以上传下达的环节、机构为中心,主要讨论当时信息渠道的构成和贯通方式”(前言第14页)。于此可见,两部分都是围绕“信息”或“信息渠道”这一中心议题来把握制度的动态运作。因此,该书虽形式上为一论集,但结合紧密,主题集中,聚焦地凸显出议题与问题意识。

上编共七篇论文,其中五篇为主编者所撰,因其在总体上有提出问题与牵引之作用,也是对“信息渠道”议题的最佳实践,这里略作梳理。《课绩与考察》从唐代考课的标准与内容出发,讨论了课绩制度的发展过程,展现出了考课的实际运作与其受制约的因素。接着立足宋代,深入讨论;《考课与监察的结合》从课绩与监察制度的交汇入手,集中探讨了地方政绩考察机制的逐步形成过程;《多途考察与宋代的信息处理机制》着眼于“宋代中央考察地方政绩的信息来源及处理机制”,以及宋廷在多途信息机制下如何处理这些不同渠道的信息;《“访闻”与“体量”》关注的“主要是宋代考察体制中承上启下的监司层级”,讨论“察访”、“访闻”与“体量”诸路径;最后一篇《关于宋代政绩考察中的“实迹”:要求与现实》,集中讨论与“实迹”相关的几个问题。此外,上编之中,虞云国讨论了宋代台谏考察地方的渠道,而余蔚则分析了宋代路级官员考核地方官政绩的履职方式。

下编《上传与下达》共九篇论文,或可说是在

把握主编思路之下,对上编的进一步丰富。这一组文章,主要讨论了诸职能部门(唐宋<sup>閣</sup>门司、登闻鼓制度、进奏院、通进银台司等)的信息运作以及文书本身这两大方面的问题,有利于我们把握不同层面制度的运作。如李全德文,从文书运行切入,考察了通进银台司的运作;高柯立《宋代的粉壁与榜谕》则独具慧眼地从“粉壁”、“榜谕”出发,展现出了政令从制定到实施的运作过程。

## 二、研究取径与方法意旨

现代学术研究的精进,不应只是简单的史实阐发,更应有方法的创新。本论集在“信息渠道”这一新议题下,在方法上提供了一些新视角,也成为本书的一大学术亮点,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。

第一,围绕“信息”这一媒介,结合时代政治背景,切实关注制度的交汇。即要在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中,更多地从制度间的交汇、从其结合层面来把握制度的运作及其相互关系,同时探究不同制度走向结合的历史背景与过程。如此,才可能真正澄清制度的运作,展现出生动的“历史场景”。邓小南即指出“尽管从体制上、从规定中,我们可以将考课与监察二者分开,但在实践中、在现实政治活动中,很难把二者撕扯开来。因此,要想准确地认识中央王朝考核吏治的方式,需要注意课绩与监察制度的交会”(第36页)。这一研究取向,正是论集前言第16页提及的“本论集的重点,不在于制度的设计,而在于实际的运作”。《课绩与考察》与《考课与监察的结合》两文即是在这一新视角下的实践。这种力图探讨在新的政治背景下制度是如何因循变革、如何发挥作用的研究路径,正是制度史研究中需要更多思考的。在以往过多注重制度条文规定的研究取向,现在的研究,需要更加重视制度的政治文化背景,以及制度和政治背景之间的互动,以此来把握制度运作的实际情况,否则很容易陷入一种“朝代类似”的怪圈,而难以准确地揭示历史的本来面目及其发展过程。邓小南揭示出不少不同以往的认识,如认为“善”、“最”标准,“只能是一套相对恒定的参照系,事实

上并未如人们往常估计的那样,在考课的实施过程中长期起着重要的作用”(第21页)。

第二,在制度史研究中必须更加注意连接制度起讫两端的“路径”。所谓“考察路径”,即“施行的方式与惯例”。主编者认为“目前的探讨,通常对制度的起讫两端注意较多,也就是说,不仅注意文件颁布的制度规定,也注意到史料中记载的实施结果。但对于研究者来说,这仍然不够。如果我们不注意联结两端的路径,则我们对于制度运行的理解,仍将很不完全”。这种更加注重“路径”的研究取向,其目的当然是要最大限度地展现出制度施行的方式与惯例,如此再反观制度条文本身是如何“规范”的,从中即可观察到规范的制度与实际运作的差异,进而可以更好地把握该时代的独特政治文化背景。而“对于制度施行‘路径’的关心,可能是一个开启点,是面向‘贯通’的一扇窗口”(第161页)。实际上,“路径”的核心还是“信息”这一根本的媒介,这是贯穿本书的一个重要纽带,也是贯通已有的基石。能抓住这一论题的本质并作出实践,当与主编者长期的学术反思与警觉分不开。如主编本人所说,“个人曾经接触过宋代政治、文官制度、区域性家族、妇女史等方面的一些论题,在感到分身无术的同时,也考虑到课题彼此之间的关联”(邓小南《走向“活”的制度史》,《浙江学刊》2003年第3期)。关联这些论题的正是“信息”及“信息渠道”。从现有的研究看,主编者通过“信息”这一路径,已基本打通了“文官选任”、“祖宗之法”到“政绩考核”诸研究的关联。本论集中,既有官员选任考核方面的讨论,也有“祖宗之法”的政治文化背景,如属于“祖宗之法”范畴的“事为之制,曲为之防”、“召和气”的思想。我们还发现,当面对一个问题时,主编者总是提醒“研究者所需要的,首先是心中的疑问与警觉,而不是某种具体的解答”(前言第11页);第169页也提到“研究者所需要的,首先是心中的一份疑问、一份警觉,而不是某种具体的解答”。这种面对一些问题时不径直解答,而旋即消解问题本身的做法,也许正是其自身警觉的一种表现。正是这种学术警觉,才更能敏锐地抓住问题的核心,提出新的议题。

第三,开阔研究视野,整合相关学科。在某种意义上说,“学科整合”是国际学术界的共识,社会科学的方法在历史研究中越来越发挥着巨大的推动作用。不过,当我们在进行跨学科研究的时候,必须对自己原有研究与其他学科的方法有深入的理解,否则生搬硬套,意义不大。同时,概念界定

需明晰。在前言部分,主编首先便对“信息”一词作了语义语源的探究(在探析语源的基础上还应从语汇透视时代之风貌变迁,如第160页,即在深入剖析语汇在具体语境中的内在含义后,力图从中揭示时代之“世变”),明晰了语汇内涵才不至于混淆套用。实际上,本论集即结合信息学、制度经济学等学科的方法,落实于唐宋之具体历史进行的较为成功的跨学科研究。此外,学科整合能否发挥出真正的力量,还需要有能牵动各方的议题,在此基础之上,通贯已有研究,才能拓展出更加广阔的学术研究空间。论集之中,研究者以“信息渠道”为纽带,结合自身研究,开辟新的学术增长点,将原有研究推进得更加深入。

### 三、学术成长与史家个性

本论集不管是议题提炼,还是具体论文,或多或少都存有主编的烙印。主编提出议题,牵引相关研究,其学术风格与思路也颇具特色。

首先,开拓创新,通贯已有。主编在已有研究基础上,提炼出“信息渠道”这一核心议题,致力于沟通宋代文官选任制度、课绩与考察、祖宗之法等学术领域的论题。可以看出,三个论题是有其内在关联的:宋代文官选任制度、课绩与考察讨论具体制度的运作,而“祖宗之法”则展现出了宋代独特的政治文化背景,两相结合,真正揭示出在独特政治文化形态下制度的实施。如果不了解一时代之独特政治文化,则势必导致生硬地解析制度,而不可能真正展现出实际运作中的制度。因为,实际运作着的制度是“规范”与“关系”折中下的产物。这些制约制度的“规范”与“关系”,即是制度之上的政治文化形态。

其次,在继承的基础上,推陈出新,“成一家之言”,展现“学术个性”。本论集中,前辈学者的成果为新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,但是,要推进学术的进步,还须不断开拓。在该论集中,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倾向,即主编者试图提供出一个具有广泛牵引力的议题(“问题”),构建一个平台来组织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参与研究。这一突破,当然有利于打破学科和朝代的界限,引发多角度思索,促进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深入交流。而另外一个层面的突破,即是“借助于当代的认识与分析方法”(前言第3页),突破当时人之“史观”。

此外,在继承已有研究的过程中,也应不断形成自己的治史风格,应有一种“个性化”的学术志业。透过本论集,还可以观察到以下鲜明特色。

第一,主编眼光敏锐独到,视野开阔,思维细腻。在众多问题中能提炼出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议题,聚焦于“信息渠道”,得益于敏锐独到的眼光。视野开阔,不但表现在具有纵览全局与国际性的宏阔学术视野,而且表现在不断吸收国际宋史学界的一些具有共识性的研究方法,如现代政治学、心理学的分析方法。又如对宋人心理的揣摩,使我们大致领略到几百年前宋人的政治思维和行事风格,彰显出官员作为政治人的诸多内涵。思维细腻是不少作者的共同特点,而作为一名女性学者,对一些问题的角度把握、分析过程都更显细腻,行文的处理也更具耐心。

第二,不断反思,对学术负责,有真正的史家良知。论集的作者在行文中常有方法论的反思与总结,不止是追求简单地还原历史。如“‘访问’与‘体量’”一文最后一部分《从路径看制度》(第160页),不仅是对该文的总结,也是对制度史研究方法的反思。这种时刻保持的警觉与反思,正是对学术整体发展方向的负责。史家的良知与批评意识,一方面是要对学术负责,另一方面即要融入到作品之中,启迪读者的智慧。在前言里,主编者即提醒有良知的史学工作者思考“该如何把握这连接‘现在’与‘过去’之间的‘思想链条’”(前言第3页)。主编者认为,在生活中发现历史的遗迹并不难,而要真正的理解“往往又需要借助于当代的认识与分析方法”。此外,在该论集中,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,即作者在写作之中,常常运用一些当下人们熟知的词汇,如“官员造材料,材料出官员”、“国家有考察网络,官吏有关系网络”、“上有政策,下有对策”等,让读者很自然地历史反思当下。这或可视为另一种把握“现在”与“过去”之间的链接。史家的关怀便通过这种种“思想链条”,给读者智慧的启迪,史学作品的意义得到丰富,其学术品质也由此而升华。

第三,实证与理论研究结合,引领国际性研究风向,牵引学术发展。主编者不但有扎实的实证研究作品问世,同时其总括反思类的文字也不断涌现,诸如《走向“活”的制度史》等文。这种在实证基础上所进行的理论反思,引起了广泛的共鸣;所提出之议题,也更具学术牵引力。如在“信息渠道”这一议题提出后,以“信息”为纽带的后续项目不断涌现,不仅有大陆学者合作的“中古时期的文

书传递与信息沟通”,同时还引起了海外学者进一步的学术合作与共同推进,如台湾学者黄宽重主持的军政信息沟通的研究,以及日本学者平田茂树等人对于政治空间与信息渠道的研究。正是在这样由点到面的不断研究中,其成果不但填补了大量学术空白,也推进得更为深入。而以这些课题为纽带,也有效地带动了国内外宋史学界广泛的学术交流,造就了国际性的高质量学术团队,形成了对学界整体的牵动力量。

#### 四、精进和增益的空间

作为一部成于众人之手的论文集,各篇论文之品质容有高下之别,主编者在前言中已有所阐明,这里略提几点。

首先,全书不免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,整个议题也有待在更多议题领域中开拓、延展、完善。比如就制度运作层次上来思考,应该逐步加强制度地方化后基层运作的研究,这也必将带动区域史的相关讨论。另外,一些论文在论证过程中,如能增多举证且更加注重不同时空下的同类多证或异类辨析,或更显完美。

其次,从论集形式上看,不少论文颇长,小标题又较多,如能在每篇论文前置一标目,则更方便读者总体把握。当然,由于成文先后有别,更因成于众人之手,前后各篇注释方式并不统一,有出注页码信息者,也有仅标注篇章者,也有因版本不同导致的个别差异。

总之,在已有研究与不断开拓创新之下,相信以“信息渠道”为媒介的相关研究,定能如论集作者所憧憬的“逐渐缜密而不止步于浮泛,注意层次程序而不满足于支离琐碎,走向开放而不是愈益封闭”,同时“引起学界对于历史上信息渠道问题更为充分的重视”,“引出更加积极热烈的学术对话”。“文场供秀句,乐府待新词”,我们也期待着学界接下来的一个又一个深具牵引力的学术新议题。

(刁培俊系厦门大学历史系副教授;  
杨辉建系厦门大学历史系研究生)

(责任编辑 何方)